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中华传统生态智慧的传承与发展

刁生虎¹

【摘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对中华传统生态智慧的传承与发展。在为什么要进行生态文明建设问题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自然环境的价值从维持人类生存的传统认知提升到文明延续的更高层次，科学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在中华先民“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的认知基础上，指出“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突破“节用”“寡欲”的传统生态保护思维，辩证提出“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在传承仁民爱物、道法自然等中华传统生态智慧基础上，科学提出“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的新目标。在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问题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继承中华传统天人合一观念基础上，创造性提出建设生命共同体的和谐家园；突破中华先民只关注自然资源经济价值的认识局限，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构建兼顾生态与经济的绿色家园；在中国古人“濯清水，追凉风，钓游鲤，弋高鸿”生活理想基础上，提出打造宜居诗意的美丽家园；正视中国古代生态权归属问题，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主张建设保障生态权共享的公平家园。在如何进行生态文明建设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中华先民顺应自然、节约资源、因地制宜的生产理念基础上，主张节约与保护相结合，坚持系统工程思路；在设置“虞”“衡”，制定律令等传统政治举措基础上，健全生态管理制度，强化生态追责意识；在以道德、故事言生态的传统教化方式基础上，强化生态保护教育，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关键词】：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中华传统生态智慧 生态权利 生态管理制度 生态保护教育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习总书记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¹。

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最为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所以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把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中华传统生态智慧一脉相承。

在回答为什么要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立足于当前的生态困境，对中华传统生态智慧进行了深刻传承、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一、为什么要进行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文明是一个永远伴随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永恒命题，决定了人类文明何去何从。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人与自然之间的矛

¹作者简介：刁生虎，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基金项目：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暨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资助项目“和：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21LLZX086）；中国传媒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高校生态伦理教育研究”（CUC200M01007）；中国传媒大学中国共产党史和文献研究专项资助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中华传统生态智慧的传承发展研究”（CUC21DS007）的阶段性成果

盾与冲突始终存在。不断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与冲突，保护生态环境，成为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重大生存课题。

1. 生态环境优劣决定人类文明兴衰

人类文明的历史就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文明的产生、发展和消亡与文明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从世界文明史层面看，人类完成原始进化、脱离动物阶段之后，人与自然的问题便随之产生。人类为了获取更多资源，往往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当生态环境难以为继时，人类文明亦会由此中断。

如古巴比伦地处两河流域，那里气候湿润、地势低平，本身就具备人类繁衍生存的便利条件，但是古巴比伦人为了获取更多耕地，大肆破坏森林，更因不懂灌溉之法，导致土地盐碱化和沙漠化越来越严重，最终拥有“空中花园城市”美誉的古巴比伦城彻底湮没在历史长河之中。同样因为过度农垦和放牧造成文明消亡的，还有玛雅文明、撒哈拉文明、古埃及文明等等。

由此可见，人类古代一些辉煌文明的终结，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人类并未认识到生态环境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基础。中华文明没有像其他文明一样消失于历史长河中，反而数千年不曾中断，这与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很早就意识到生态环境优劣决定人类存亡有着重要关联。中国古代哲人对自然化育万物之功多有称赞。

如赞道：“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²“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³在此基础上，中国古人进一步从正反两个方面探讨生态环境与人类文明之间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如指出：“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乐干禄焉。若夫山林匮竭，林麓散亡，薮泽肆既，民力凋尽，田畴荒芜，资用乏匮，君子将险哀之不暇，而何易乐之有焉？”⁴人类取用于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过度消耗自然资源，受害者终将是人类自己。

中国古人从人本视角表明，人类文明想要繁荣就必须保护好生态环境及自然资源。“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廩不盈。”⁵“故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⁵这些都说明，自然不仅是生存之本，更是立国之基。因此，生态环境的优劣决定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广度、深度和持久度。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继承了中华传统生态观念中重视自然环境价值这一大智慧，实现了传统生态智慧与现代生态思想的交融汇通。但中国古人在谈及自然环境的价值时，往往局限于生存层面，或是将保护生态与维护君主统治联系起来，使其具有封建性和阶级性色彩。

而习总书记超越了中国古人认知生态价值的局限，站在人类永续发展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高度，以全球视野和世界眼光看待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科学、客观地认识到生态环境对人类文明的重要性，提出了“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⁶“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⁶“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⁶“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⁶等一系列高瞻远瞩的论断，将自然环境对人类的生存价值提升到延续中华文明甚至世界文明的更高价值层次，在传承中华传统生态智慧的同时，又将其创新性发展，从而不断深化、提升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生态理念。

2. 生态自愈有限性与人类索取无限性的矛盾

随着人类能力的发展和自我意识的膨胀，人类产生越来越强的物质享受欲望：“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财蓄积之富也。”⁷人类有欲望是正常的，可是如果“纵欲而不穷”⁷，那么祸患亦是无穷的。虽然生态具有一定的自我修复能力，但“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⁸，历史证明，生态自愈速度远不及人类的破坏速度。

《六韬》记载：“纣尝六月猎于西土，发民逐禽。民有谏者曰：‘六月天之后，坐地以务长养之时也；六月逐禽，是逆天道，绝地德，而人行贼，天子失道，后必无福。’纣以为妖言而然之。……后其年，天大黑，风飘牛马，发屋拔禾，人飞扬数十里。”⁹

殷纣王肆意破坏生态环境，以致自然环境迅速恶化，为其灭亡埋下伏笔。

《孟子·告子上》言：“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¹⁰牛山在人们过度砍伐与放牧后，再难重现往日生机勃勃的景象。由此可见，生态自愈能力是有限的。

近代以来，人类认识自然与改造自然的能力增强，人类中心主义逐渐形成。瑞典著名博物学家林奈就曾表示：“‘所有的东西生来都是为人服务的’，因而，在‘赞美造物主的产品’的过程中，人们还能够期望去享受那些他所需要的使他的生活舒适愉快的一切东西。”¹¹林奈派甚至宣称：“生态学的研究是征服生物世界的有力工具。”¹¹

艾文荷曾经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进行过解释：“自然本身就是以任何我们乐意的方式为我们所利用的。”¹²“根据这种观点，只有人类的需要和欲望具有价值，其余的自然界仅仅是为了我们而存在。”¹²随着全球化生态危机日益加剧，人类中心论的可信度正在逐渐降低。

金岳霖曾表示：“自我中心的困境使个人看不到他和其他个人之间的基本同一性，人类中心主义的困境则使他无视他和其他动物、其他生物和事物之间的同一性。”¹³在此基础上，金岳霖曾提出“普遍同情的态度”¹³来纠正人类中心主义的偏激与错误。可是，从当前大气污染、疫病扩散的全球生态现实情况看，这一观念在过去并未得到足够重视。

面临深刻的生态危机与全新的时代考验，人类急需一场新的思想启蒙。习总书记指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深入，生态文明建设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¹⁴在对生态自愈有限性的认识上，中国人通过举纣王之乱与牛山之无的例子来警示后人，习总书记则以“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¹⁵对其进行高度凝练与理论总结。

在对人类索取无限性的认识上，中国人常说：“民生在勤，勤则不匮。”¹⁶合理的欲望对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但若人类之“勤”超过限度，让自然界难以忍受人类“暴力”，最终必然会危害人类的福祉。中国古人为了防止“纵欲”¹⁷所带来的危害，常主张“寡欲”¹⁸，走向另一种极端。我们既应看到“纵欲”的危害，也应摆脱“寡欲”的束缚，“纵欲”和“寡欲”都不是最佳选择。

习总书记一分为二地看待人的欲望，更为科学地认识到人欲背后蕴含的发展契机，辩证地提出“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¹⁵“经济发展不应是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竭泽而渔，生态环境保护也不应是舍弃经济发展的缘木求鱼”¹⁵等系列论述，肯定生态保护与社会发展的兼得性。

同时，习总书记没有像古人那样，完全依赖于生态自愈，而是提出更为主动、积极的人为修护方案，如对荒漠化、石漠化进行综合治理¹⁵，坚持以“污染防治和生态修复并举”¹⁵方式维护海洋自然再生产能力，等等。由此可见，习总书记在协调生态自愈有限性与人类索取无限性的矛盾时，对中华传统生态智慧进行了符合当代实际的转化与发展。

3. 生态保护是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重大生存课题

热爱自然与保护生态的传统是中华先民留给当代中国人的巨大精神财富，对其加以传承与发展是当代中国人的使命与责任。

中国古代先贤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做过深入的思考，其中以儒道两家尤为深入，为后世保护自然奠定了仁民爱物、道法自然的主基调。孔子主张“仁”，“仁者爱人”¹⁶。人首先爱的是父母兄弟，而后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¹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¹⁶等推己及人的过程中，使源于亲情的仁爱之心扩展为对所有人的普遍关爱。

孟子与荀子从类本质层面对其进行解答：“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¹⁶“圣人者，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¹⁷只要是人，就是同类；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圣人之所以被称为圣人，就是因为他们能够将自己的爱心投射到其他人与物上：“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¹⁶因此，孟子认为，人不仅要爱他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¹⁶，而且要爱万物——“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

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¹⁶。孟子继承了孔子“泛爱众而亲仁”¹⁶的思想，提出了“仁民而爱物”¹⁶的伦理学命题，“爱物”在孟子这里已然明朗¹⁹。比之前人，荀子更加重视人们能否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荀子认为：“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汗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¹⁷作为原始儒家的三大代表人物，孔、孟、荀三家思想虽然各有侧重，但都秉持“仁民爱物”的原则，以己之心度人之情、度物之性，弘扬天地之生生大德。

道家与儒家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作为共同理想，但是道家以道法自然作为实现理想的途径。在道家看来，作为人类，不破坏万物原本之成长规律与生命活力，就可以被称为有道德者。老子所说的“道常无为而无不为”²⁰，是指“道”不会刻意干预事物发展变化的自然规律，而是做顺物之自然情性的事。

只有如此，方能“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²⁰“衣养万物而不为主”²⁰“万物归焉而不为主”²⁰。之后，庄子继承老子思想，认为应尊重宇宙万物，不应当左右其生长、消亡的自然过程。“以道观之，物无贵贱”²¹“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²²。可见，“齐同万物”是庄子看待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基本观点与态度。

“老庄自然无为的生态智慧对今人无疑具有相当的启示作用。它使我们认识到：人类当前所面临的严重的环境污染与生态失衡的困境，主要是由于人忽视了自然的独立性，未尊重其主体地位和客观规律，没有以平等的身份对待自然万物。事实上，在生命的意义上，人与万物既是有别的，又是平等的。”²³

习总书记在思考当前生态文明建设时，明确表示：“我们中华文明传承五千多年，积淀了丰富的生态智慧。……这些质朴睿智的自然观，至今仍给人以深刻警示和启迪。”²⁴“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²⁵

习总书记的生态文明思想中的许多重要理念与举措都体现出对以儒道为主的中华传统生态智慧的重视与传承。如：“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²⁴“让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成为主流的生产生活方式”²⁴等论述，是对儒家仁民爱物观的丰富发展；“人类发展活动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²⁴“只有尊重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²⁴等论述是对老庄道法自然观的现代诠释。

可见，中华传统生态智慧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认识与思考为当前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在“天定胜人”²⁶的阶段，中华先民提倡的人与自然和谐是一种感性的、直观的认知，而非理性的、自主的选择。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则是习总书记站在历史和未来的高度看待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从而做出的时代抉择。习总书记指出：“你善待环境，环境是友好的；你污染环境，环境总有一天会翻脸，会毫不留情地报复你。

这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²⁷与中华先民推崇的人与自然和谐相比，习近平的生态文明思想，在理性与科学精神的促使下提出“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²⁴，实现了中华传统生态智慧在新时代的升华与突破，为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奠定了生态文明的基础，也为解决人类生态困境提供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二、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中华传统生态智慧进行借鉴与创新，突破传统生态思想的一些藩篱，绘制出和谐、绿色、美丽、公平

的生态文明建设愿景。

1. 建设生命共同体的和谐家园

中华先民得益于自然环境和广大宇宙的善意滋养，生成天人合一的思维观念。钱穆认为，天人合一观、“人文自然相互调适之义”是中国文化于世界、于人类的最大贡献²⁸。季羨林认为，“天”就是自然，“人”就是人类，天人合一就是在讲人与自然合一²⁹。

中国古代哲人尽管观点各异，但天人合一思想却是各家各派共同的理论基础与思维取向。孔子的“唯天为大，唯尧则之”³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³⁰等论述无不蕴含着天人合一的思维。老子之“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亦不仁，以百姓为刍狗”³¹“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³¹等观点展示出因循自然、合人于天的致思路径。

庄子更是明确反对“以人灭天”“以故灭命”³²，而主张“与天为一”³²“人与天一”³²，庄子对天人合一的表述最为明确而清楚。董仲舒在论述中借鉴了阴阳五行思想，以“天人相类”³³建构人与天地相参的宇宙观。宋代张载则明确提出了“天人合一”³⁴。明代王阳明提出“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³⁵，清代孙奇逢亦表示“天人一体”³⁶。

习近平在 2021 年“领导人气候峰会”上宣示：“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³⁷中华传统生态智慧推崇“利万物”，所以中华先民看重事物的整体性与关联性，追求天、地、人共生共存的精神世界。命运共同体是习总书记在继承天人合一思想下，创造性提出的辩证、系统、科学的理论，不仅彻底批判了西方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核心的生态理念，而且为正确认识生态问题提供了本体论依据。

从天人合一到命运共同体，内在精神意蕴并未改变，但命运共同体理论在“合”的关系上更为明确、细致地划分出“山水林田湖草”、人与自然两个命运共同体，肯定了除去人之外的自然万物亦有其自身的内在本性与生存意义，不仅逻辑更为缜密，内涵更为丰富，而且更清晰地体现出对生态环境的尊重。

在“山水林田湖草”命运共同体问题上，习总书记指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形象地讲，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如果破坏了山、砍光了林，也就破坏了水，山就变成了秃山，水就变成了洪水，泥沙俱下，地就变成了没有养分的不毛之地，水土流失、沟壑纵横。”³⁸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总书记将“山水林田湖”进一步完善为“山水林田湖草”。“山水林田湖草”命运共同体理论科学地指出自然界各个生态要素之间是互相依存、互相影响、互相激发活力的复杂关系，任何一个要素在短期内发生突然性的巨大变化，都会影响到其他因素，从而造成一系列连锁反应，打破生态平衡。

建设生命共同体的和谐家园，首先要系统地了解山水林田湖草等自然要素存在的功能与价值，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某一种生态要素优于另一种生态要素，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所接触到的整个自然界构成一个体系……它们是相互作用着的。”³⁹

在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问题上，习总书记提出：“要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天人合一，不要试图征服老天爷。”⁴⁰足见其对天人合一生态智慧的继承。在此基础上，习总书记进一步明确指出：“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命运共同体。”⁴¹“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⁴⁰这表明，人与自然有共同发展或灭亡的命运，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时，不能简单采取对象化的态度或行为，而应该将其视为统一体来对待，实现了从二元认识论向一元本体论的转变，而这也正是中华传统生态智慧的精髓所在。

当前很多城市、地区为了营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氛围，进行“违背自然规律、超越生态承载能力和环境容量建设”⁴⁰，导

致大树进城、人造景观、开山造地等诸多“伪生态文明建设”⁴²现象。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家园，必须“探索一条符合自然规律、符合国情地情的绿化之路”⁴³。因此，习总书记在谈及城市、农村绿化问题时，提出“把城市放在大自然中”⁴³，“搞新农村建设……要让它们（乡情美景）与现代生活融为一体”⁴⁴，诠释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真正奥义。

2. 构建兼顾生态与经济的绿色家园

关于生态环境的经济价值，中华传统生态智慧早已给出答案。从宏观来看，《国语·鲁语》言：“及九州名山川泽，所以出财用也。”⁴⁵这体现出中华先民将自然资源看作财富之源。《左传》将生态资源比作珍宝：“夫山、泽、林、盐，国之宝也。”⁴⁶这些论述都充分表明生态资源能使人获得经济效益。

从微观来看，人类的衣、食、住、行皆离不开自然。“君子狐青裘豹褰”⁴⁶“冬日麕裘，夏日葛衣”⁴⁷都表明动植物在制衣上对人类的贡献。在饮食上，人类也依赖于动植物。《左传·庄公十年》中有“肉食者”⁴⁶一词，孟子的仁政理想中也包含着“七十者可以食肉矣”⁴⁶。《吕氏春秋·审时》篇中的禾、黍、稻、麻、菽、麦六种农作物是人类重要的粮食⁴⁸。

在起居出行上，中华先民“构木为巢”⁴⁷“剡木为舟”⁴⁹“木直中绳，以为轮”⁵⁰，可见树木在制作屋、舟、车中的广泛应用。“肇牵牛车，远服贾”⁴⁹“我任我犂，我车我牛”⁴⁹，可见牛在耕田、拉货等生产生活中的重要性。“斫木为耜，揉木为耒”⁴⁹的文献记载以及目前已经出土的战国铁犁、秦始皇陵园赵背户村山十铁犁铧、陕西关中汉代全铁犁铧都证明树木与铁矿资源对人类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周礼》记载了中国古人巧用“嘉草”⁴⁹“莽草”⁴⁹等草药熏杀害虫，治理虫灾。

正因自然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以破坏生态为代价求取GDP上涨的经济发展模式曾盛行一时。GDP确实是衡量社会发展情况的有效指标，然而如果GDP至上甚至唯GDP，虽然短时间内经济效益会显著提升，但是最终会伤害人类自己。恩格斯说：“其实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原材料，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⁵¹

因此，习总书记看待生态环境的经济价值时，提出“破坏生态环境就是破坏生产力，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经济增长是政绩，保护环境也是政绩”⁵²“我们既要GDP，又要绿色GDP”⁵³“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绝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⁵⁴“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⁵⁴等系列论述。

相较于中华传统生态智慧，习总书记没有像前人一样只关注生态作为资源的使用性价值，而是将生态与生产力统一起来，以现代发展眼光对生态价值进行更为全面、科学的再认识、再评价。“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论述，旨在兼顾生态与经济，推动生态从资源转化为资产、资本，从自然财富转化为社会财富、经济财富，依托丰富生态资源和优质环境质量发展绿色养殖、生态旅游，走建设生态文明与发展经济相得益彰的致富路。

习总书记在任浙江省委书记时就提出“推进生态建设，打造‘绿色浙江’”⁵⁵的“绿色经济”概念。在扶贫开发工作中，习总书记指示：“要通过改革创新，让贫困地区的土地、劳动力、资产、自然风光等要素活起来，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让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带动贫困人口增收。”⁵⁴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于生态经济价值的认识更为深化、科学，在生态危机日益凸显的今天，更应坚定不移走生态与发展相协同的新路径，建设兼顾生态环境与经济效益的绿色家园。

3. 打造宜居诗意的美丽家园

随着经济、文化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不再仅沉醉于物质生活的满足，而是对诗意栖居的理想生活有了更多追求和向往。

如果自然环境适宜，物质资源丰富，人们的生产生活就能顺利开展，精神世界才会感受到安逸与快乐；反之，如果环境被破坏，不仅温饱成了问题，而且人类健康会受危害。中国古人对此深有体会。管子言：“顺天之时，约地之宜，忠人之和。故风雨时，五谷实，草木美多，六畜蕃息，国富兵强，民材而令行，内无烦扰之政，外无强敌之患也。”⁵⁶

孟子也曾经描绘过在自然生态较好情况下，老百姓安居乐业生活的图景：“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⁴⁴如果说先秦人对生态环境的理解尚处于生存的层面，那么东汉张衡的《归田赋》对生态环境的理解则在生存的基础上增添了诗意的追求：“仲春令月，时和气清。

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王雎鼓翼，鸧鹒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嚶嚶。于焉逍遥，聊以娱情……弹五弦之妙指，咏周孔之图书。挥翰墨以奋藻，陈三皇之轨模。”⁵⁷ 仲长统的《昌言》中也描绘出山清水美、悠游自在的生活：“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匝，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踟蹰畦苑，游戏平林，濯清水，追凉风，钓游鲤，弋高鸿……与达者数子，论道讲书，俯仰二仪，错综人物。

弹南风之雅操，发清霜之妙曲。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⁵⁸ 青山绿水、茂林翠竹、游鱼走兽在很大程度上会给人以愉悦的美感体验，从而使人达到诗意畅快的精神境界，正如习总书记指出的：“金山银山固然重要，但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是金钱不能代替的。”⁵⁹

从古至今，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美丽家园的追求。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要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党的十九大重申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性。具体而言，建设美丽中国、美丽家园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舒适宜居的生活环境。习总书记指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健康的基础。”⁵⁹

生态环境中的空气、饮用水、粮食是每个个体生存发展的刚需，因此生态文明建设成功与否首先在于能不能让人民“呼吸上新鲜的空气、喝上干净的水、吃上放心的食物、生活在宜居的环境中”⁵⁹，能不能满足人民对舒适栖居环境的需要。但是当前一些城市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盲目拆改，用草地、喷泉代替古树、溪流，破坏了当地本具有的良好生态风貌。

对此，习总书记指出，要让城市融入大自然，不要花大气力去劈山填海，很多山城、水城很有特色，完全可以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塑造城市景观⁶⁰。美丽家园、美丽中国推崇的是一种契合自然、不矫揉造作的宁静、美丽状态，这才是中国人孜孜以求的“濯清水，追凉风，钓游鲤，弋高鸿”⁵⁸的生活理想。

二是诗意满足的栖居心情。在城镇发展过程中，很多古建筑被拆毁，取而代之的是林立的高楼。从实际效益看，这种行为劳民伤财，当地人民并未真正从城镇化中得到切实利益；从情感尊重看，中国人在民族文化的影响下素有安土重迁、怀恋故土的性格传统，这种行为严重损害了当地人民对故土情结的满足感与文化身份的认同感。

习总书记早在浙江工作时就明确反对因旧城拆迁而破坏文物古迹的行为：“现在有的地方搞旧城拆迁改造，把一些文物古迹搞得荡然无存，这是非常可惜的。”⁶¹ 他肯定了当时杭州景区在保护文化遗存、延续城市文脉、弘扬历史文化方面发挥的带头作用。文物古迹是历史文化的证明，保存文物古迹就是保存历史。

如果一座历史名城中只剩高楼大厦，那么这座城市就会失去历史记忆与个性，我们如今所倡导的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就成为无根之谈了。中国古人虽然对诗意栖居进行了细致描绘，但是其诗意满足仅限于自我。而当前美丽中国建设突破了中国古人的“小我”，注重在现代化进程中对中华民族文化与精神的传承与保护，这是根据保留民族根性、激发文化自信的现实需要所提出的新要求。

因此，打造宜居诗意的美丽家园不仅要“让中华大地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⁵⁹，而且要保留住在民族文化

与地域文化浸染下特有的历史记忆与情感寄托，“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⁶⁰。

4. 保障生态权共享的公平家园

生态权利公平，指在整个生态系统中不同主体在生态资源配置与利益分配的过程中享有被公平对待的权利，而在生态遭受破坏时共同履行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但是，生态权利公平在中国古代阶级社会中显然是一种奢望。中国历代国君几乎都有私人苑囿，贵族世家效法国君，将一些山泽占为己有，造成“富强者兼岭而占，贫弱者薪苏无托”⁶²的局面。

虽然中国古代哲人对此种现象多有批评，如：“山林薮泽之利，所以与民共也。虞之，非正也。”⁶³“林麓川泽以时入而不禁。”⁶⁴“盖欲与民通才共利，不独专之也。”⁶⁵但在实际情况中，想要实现与民共利则困难重重。在南朝刘宋时期，有官员上书希望还地于民，但尚书左丞羊希表示：“占山封水，渐染复滋，更相因仍，便成先业，一朝顿去，易致嗟怨。”⁶²

羊希的话揭示出当时想要推行生态公平的阻力是巨大的，因此政府只好采取折中的方式：“常加功修作者，听不追夺。……若先已占山，不得更占；先占阙少，依限占足。”⁶²事实上，这种措施依旧承认贵族阶级独占生态资源的合理性，对推进生态公平并未起到真正的作用。

习总书记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⁶⁶这一观点正视了中国古代生态权归属的问题，对中华先民几千年的理想进行科学化的表述与总结，更是对其质的超越与提升。习总书记将生态环境定性为“公共产品”，这就与中国古代生态观从本质上区分开来。首先，中国古代哲人虽然对山泽私有有所批评，但没有直接说明生态的公有性质，甚至认为在私人“常加功修作”的情况下仍允许其独占。而习总书记则是从根本上将生态环境的所有权归于广大人民群众，提出了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即所有权的平等。其次，在中国古代，即使将山泽开放给百姓，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对于生态环境的享有程度也是不同的。而当生态环境作为“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时，就说明所有人在享受、利用生态环境方面是绝对平等的。

习总书记关于生态权利的论述谈到“每个人”的概念，这也是对中华传统生态智慧的巨大超越。首先，“每个人”包含弱势群体。过去，“癌症村”“毒气村”的报道屡见不鲜，说明农村地区与农民群体生态权存在缺失。习总书记多次强调：“建设好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让广大农民在乡村振兴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⁶⁷

在此基础上，习总书记就西藏、四省藏区、武陵山区、滇黔桂部分贫困地区的生态问题做出指示：“要加大贫困地区生态保护修复力度，增加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扩大政策实施范围。”⁶⁶这些地区往往在经济发展上亦有迫切需求，故而习总书记就如何兼顾生态与脱贫两方面进行深入思考，提出“生态脱贫”的新思路：“结合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可以让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就地转成护林员等生态保护人员，从生态补偿和生态保护工程资金中拿出一点，作为他们保护生态的劳动报酬。”⁶⁶

这就表明，当前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对弱势群体的生态权利更加关注，正建立起真正公平公正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其次，“每个人”包含后代人。代际公平就是保证各个世代的公平，世代既包括当代人，又包括后代人。人类是在地球上长期繁衍的生物，这意味着是当代人与后代人共同拥有地球上的各种资源，都有权享受生态环境带来的福利。

而后代人具有需求不确定性、主体地位缺失性与时间无限延续性。因此，为了人类的繁衍，当代人必须保证将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传递给后代子孙。古人生态观念对后代人的生态权利鲜有提及，而习总书记明确表示：“我们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用破坏性方式搞发展。”⁶⁶这一论述体现了对后代人生态权利的重视与保护，具有长远意义。

三、如何进行生态文明建设

理论内容的构想与提出，最终还是要要在现实中发挥效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就要节约与保护相结合，坚持

系统工程思路；健全生态管理制度，强化生态追责意识；强化生态保护教育，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1. 节约与保护相结合，坚持系统工程思路

中华先民对如何维护生态环境系统有诸多探索。老子言：“天之道，其犹张弓！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与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⁶⁸他指出，自然之道在于系统与平衡。孔子、孟子、荀子、管子都曾多次论述，使用自然资源要遵循时节变动与动植物生长自然规律，合理使用，如说“上律天时，下袭水土”⁶⁹“不违农时”⁶⁹“斧斤以时入山林”⁶⁹“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⁷⁰“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⁷¹。

明清时人开始有意识建设和谐的农林生态系统。人们在田地旁修堤建坝，当遇到干旱时节，就将堤中之水引进田地进行灌溉；在水堤周围，人们种植蔬菜、豆子、榆树、柳树等植物，在水堤之中养殖鱼虾等水产品。这些论断与做法体现出中国古人对生态系统整体性的初步理解，反映出先民顺应自然、节约资源、因地制宜的和谐生态实践理念。

在农业文明时期，人类开发自然与改造自然的能力尚弱，对生态的破坏程度也在可控范围内。如今生产力水平、科技水平已经远超古代，衍生出的许多生态问题也是中国古人不曾遇到的。因此，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继承了中华传统生态智慧，对中华先民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优良传统进行了一系列现代阐发。

在实践态度上，习总书记将人与自然视为一体，提出：“要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⁷²在产业结构上，习总书记强调，要“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⁷²。

在能源开发上，习总书记指出：“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优化能源结构，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推动重点领域节能。”⁷²在实体经济上，习总书记指示：“支持制造业绿色改造，引导实体经济向更加绿色清洁方向发展。”⁷²在北京冬奥会筹办上，习总书记指示：“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办奥理念……要贯穿筹办工作全过程。”⁷²

同时，习总书记从当前现实需要出发，按照系统工程的思路，协调整体与要素、要素与要素之间的复杂关系，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地思考生态问题，提出“对山水林田湖进行统一保护、统一修复是十分必要的”⁷³“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生命躯体，应该统筹治水和治山、治水和治林、治水和治田、治山和治林等”⁷²等论述，对“上律天时，下袭水土”、用养结合、因地制宜等中华传统生态智慧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在福建工作时期，他曾以修堤与使用地热水为例指明生态系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质：“修了一道堤，人行车通问题解决了，但水的回流没有了，生态平衡破坏了；大量使用地热水，疗疾洗浴问题解决了，群众很高兴，但地面建筑下沉了，带来了更为棘手的后果。”⁷⁴

在谈及地区可持续发展时，习总书记指出：“从生态系统整体性着眼，可考虑加大河北特别是京津保中心区过渡带地区退耕还湖力度，成片建设森林，恢复湿地，提高这一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⁷⁵在谈及城市规划问题时，习总书记一针见血地指出：“城市规划建设的每个细节都要考虑对自然的影响，更不要打破自然系统。”⁷⁶

2. 健全生态管理制度，强化生态追责意识

当前我国面临的生态困境不仅仅是单纯追求经济效益造成的，与之前政治、法律制度不完善不健全也有很大关系。习总书记坚定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⁷⁵

早在尧舜时，统治者就设置了保护生态环境的职位——“虞”与“衡”；夏、商、周在此基础上又设置了山虞、泽虞、川衡、林衡等职务，分类更为细致。秦简《田律》、甘肃敦煌悬泉置汉代遗址发掘出土的泥墙墨书《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规定了人们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时节。魏晋六朝时人们延续前代传统，设置专门负责自然管理的职官，如北齐有虞曹主事与虞曹郎中，北周有山虞、泽虞、川衡、林衡等职官。

北魏时期，孝文帝为了鼓励百姓种植经济林，曾特地颁布诏书：“男夫一人给田二十亩，课蒔余，种桑五十树，枣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给一亩，依法课蒔榆、枣。奴各依良。限三年种毕，不毕，夺其不毕之地。于桑榆地分杂蒔余果及多种桑榆者不禁。”⁷⁷硬性指标的确定，对百姓种树起到极大的敦促作用，在当时形成了一股植树热潮。南朝宋时曾有诏言：“擅占山泽，强盗律论，脏一丈以上皆弃市。”⁷⁷可见，当时的法律对擅自占用山林的人，处罚是非常严厉的。《唐律疏议·杂律》中可见大量的环境保护条款。清朝增设了负责水利的官职都水监，制定专门的狩猎和林木管理条例。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乃至引领者。能有这样的贡献，与健全制度、强化追责是密不可分的。一是生态管理制度的逐渐健全。在习总书记看来，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立章建制⁷⁵。而颁发诏书、颁布法律也是中国古人在保护生态上最常用的政治手段之一。

习总书记强调制度在生态保护上的重要性：“要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⁷⁵目前，我国生态管理制度内容丰富，有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等等，具有覆盖范围广、体系化强的特征。合理完善制度的建立健全，在一定程度上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可靠保障与有效参考。制度往往规定了生态红线，红线的意义在于约束。

习总书记多次强调：“生态红线的观念一定要牢固树立起来。”⁷⁵这些生态环境管理制度的确定就是在告诫全党全国，即使有巨大经济效益的诱惑，也坚决不能逾越制度中的生态红线。由此可见，新时代的中国不再单纯以 GDP 的高低来评价发展的好坏，而是将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使之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导向和约束⁷⁵。

习总书记在参加河北省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明确表示，发展要去掉“紧箍咒”，“在治理大气污染、解决雾霾方面作出贡献了，那就可以挂红花、当英雄”⁷⁵。针对贵州发展问题，习总书记指出：“我们强调不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不是不要发展了，而是要扭转只要经济增长不顾其他各项事业发展的思路。”⁷⁸

二是生态追责意识的逐渐强化。习总书记明确表示，对领导干部要建立责任追究机制。实践证明，生态环境保护是否能够有效落实，关键在于领导干部。习总书记指出，当前湖泊湿地被滥占，很大程度上就是产权不到位、管理者不到位所导致⁷⁸。因此，习总书记反复重申对领导干部的责任追究问题：“要落实领导干部任期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制，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认真贯彻依法依规、客观公正、科学认定、权责一致、终身追究的原则。”⁷⁸“对那些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必须追究其责任，而且应该终身追究。”⁷⁸权责不明，生态保护就会落空，节用控污的具体实践就难以广泛开展。而将责任分配到个人，能够明确生态所有权、使用权、管理权之间的责任关系，增强对某些领导干部利用职权之便，牺牲生态环境，换取私利行为的监督与管控，更好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在这种意识下，习总书记针对腾格里沙漠遭企业污染、青海祁连山自然保护区与木里矿区被破坏性开采等情况多次强调，要“扭住不放”⁷⁸“一抓到底”⁷⁸“举一反三”⁷⁸。在生态责任问题上，习总书记提出“河长制”，由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担任“河长”，负责组织领导相应河湖的管理和保护工作，这是对中国古代设立山虞、泽虞、川衡、林衡等自然管理官职的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3. 强化生态保护教育，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处理生态问题，必须抓住矛盾的关键，即人类自己，因此，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在全社会范围内加强生态保护教育，营造优良

好的环保氛围。只有人们对生态环境具有发自内心的热爱与关切，整个生态文明建设才能顺利开展。

中国古代思想家非常重视人的教化，而这也体现在生态问题上。首先，中国古人将生态保护上升至道德层面，把生态保护与传统孝观念、圣人标准相结合。孝道在中华文化中分量是极重的，将生态保护提升至孝的高度，无疑会在当时人们心中增加对生态保护的重视。孔子言：“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⁷⁹曾子说：“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劳，大孝不匮。”⁷⁹这说明，最高的孝道就是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老子言：“圣人去甚，去奢，去泰。”⁸⁰将节俭不浪费的环保生活方式作为圣人评判标准，为当时民众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其次，是通过讲述故事的方式向民众普及生态保护观念。《庄子》中很多故事都闪耀着顺物之情的生态色彩。世人都称赞伯乐识马，庄子却从马（自然）的角度进行思考。觅草饮水、自由自在是马的真性情。对马而言，遇上伯乐是大不幸。在伯乐这里，马原本自由的天性被无视，转而“烧之，剔之，刻之，锥之，连之以羁縻，编之以皂栈”⁸¹，“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櫜饰之患，而后有鞭策之威”⁸¹，以各种方式和手段胁迫它们摒弃自己的天性。这样训练出来的马，其温厚善良之天真本性已经荡然无存，变得性情暴躁，反而对人不利。庄子以马喻自然，批评人对自然的伤害。再如庄子在庖丁解牛故事中指出按自然规律办事的必要性。当庖丁掌握了牛体构造，按照牛骨缝隙进行解剖时，不仅能够较为轻松地进行解剖，而且能够保护好刀具，增加其使用年限。正如庖丁自己所说：“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⁸²《吕氏春秋》曾记载亶父夜渔者放生小鱼的故事：“巫马旗短褐衣弊裘，而往观化于亶父，见夜渔者，得而舍之。巫马旗问焉，曰：‘渔为得也。今子得而舍之，何也？’对曰：‘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鱼也。所舍者小鱼也。’”⁸³借此说明人不应妨碍万物自然生长的道理。

即使在信息传播手段不那么发达的古代，人们也已经意识到教化与宣传的力量。以古鉴今，当前国家制定的生态规章制度必须经由普及教育、广泛宣传才能使广大人民对生态保护有深刻而清晰的认知。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习总书记明确强调：“要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⁸⁴由此可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中华传统生态智慧一样，非常重视生态保护的教育宣传。

从教育宣传的内容看，习总书记呼吁保护森林：“绿化祖国，改善生态，人人有责。”⁸⁴主张勤俭节约的消费观：“要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勤俭节约的消费观，树立节能就是增加资源、减少污染、造福人类的理念，努力形成勤俭节约的良好风尚。”⁸⁴从教育宣传的对象看，习总书记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参加义务植树，身体力行在全社会宣传新发展理念。”⁸⁴对消费者发出倡导：“推广节能、节水用品和绿色环保家具、建材等，推广绿色低碳出行，鼓励引导消费者购买节能环保再生产品，推动形成节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⁸⁴对少年儿童进行激励：“大自然充满乐趣、无比美丽，热爱自然是一种好习惯，保护环境是每个人的责任，少年儿童要在这方面发挥小主人作用。”⁸⁴而习总书记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在正定工作时期，只要不出正定城关，一定骑自行车上下班，锻炼身体的同时践行环保理念。此外，习总书记从2013年起连续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从教育宣传的方式看，我们当前的宣传教育方式相比于古代来说已经是大大丰富了。2011年，我国推出《美丽中国》纪录片，向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生动展现了新时代中国良好的生态风貌。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塞罕坝造林、毛乌素治沙等生动范例登上报纸、电视，成为全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榜样。习总书记倡导在国家范围内积极评定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以带动周边地区乃至全国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当前，形式活泼的环保公益性活动不断涌现，例如多地以徒步、登山、慢跑形式开展捡拾垃圾公益活动。这些观念、举措与中国古代宣传教育方式相比，突破了一家一户的局限，表明生态文明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其境界更高，科学性更强，而且形式更加生动活泼，更易为人民群众所接受、喜爱。

综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既深刻传承了中华传统生态智慧，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智慧基因，又对中华传统生态智慧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具有全球性、时代性的广阔视野，是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

注释：

-
- 1[1]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0 页。
- 2[2]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526 页。
- 3[3]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校释》，学林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55 页。
- 4[4]徐元诰撰：《国语集解》，中华书局 2002 年版，第 107 页。
- 5[5][6]黎翔凤撰：《管子校注》，中华书局 2004 年版，第 3 页，第 1426 页。
- 6[1][2][3][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6 页，第 7 页，第 5 页，第 5 页。
- 7[5][6]王天海校释：《荀子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50 页，第 419 页。
- 8[7]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483 页。
- 9[8]王继光：《敦煌唐写本〈六韬〉残卷校释》，《敦煌学辑刊》1984 年第 2 期。
- 10[9]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751 页。
- 11[10][11]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侯文惠译，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第 58 页，第 75 页。
- 12[12][13]艾文荷：《早期儒学与环境伦理学》，安乐哲编：《儒学与生态》，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66 页，第 67 页。
- 13[14][15]金岳霖：《金岳霖文集》第 2 册，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29-630 页，第 630 页。
- 14[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77 页。
- 15[2][6][7][8][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3 页，第 19 页，第 19 页，第 46 页，第 46 页。
- 16[3][10][11][12][13][15][16][17][18][19]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880 页，第 2730 页，第 2518 页，第 2479 页，第 2749 页，第 2773 页，第 2670 页，第 2771 页，第 2458 页，第 2771 页。
- 17[4][14][21]王天海校释：《荀子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19-425 页，第 181 页，第 381 页。
- 18[5]朱谦之撰：《老子校释》，中华书局 2000 年版，第 75 页。
- 19[20]关于儒家丰富而深刻的生态伦理思想，参见刁生虎：《儒学的生态关怀及其当代价值》，《诸子学刊》第 4 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47-60 页。
- 20[1][2][3][4]朱谦之撰：《老子校释》，中华书局 2000 年版，第 146 页，第 137 页，第 137 页，第 138 页。

-
- 21[5]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中册，中华书局 2012 年版，第 576 页。
- 22[6]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上册，中华书局 2012 年版，第 85 页。
- 23[7]刁生富、刁生虎：《老庄生态智慧论》，《求索》2001 年第 4 期。
- 24[8][10][11][12][13][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6 页，第 8 页，第 26 页，第 13 页，第 11 页，第 20 页。
- 25[9]习近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求是》2019 年第 3 期。
- 26[14]《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构建与实践探索》一书第四章《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中，作者提到了人与自然关系演变分为三个阶段，即“天定胜人”“人定胜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参见潘家华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构建与实践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91-92 页。
- 27[15]习近平：《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41 页。
- 28[1]钱穆：《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中国文化》1991 年第 1 期。
- 29[2]季羨林：《“天人合一”新解》，《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 年第 1 期。
- 30[3][4]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487 页，第 2526 页。
- 31[5][6]朱谦之撰：《老子校释》，中华书局 2000 年版，第 22 页，第 103 页。
- 32[7][8][9]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中册，中华书局 2012 年版，第 589 页，第 631 页，第 688 页。
- 33[10]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 1992 年版，第 341 页。
- 34[11]汤勤福导读：《张子正蒙》，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39 页。
- 35[12]王晓昕译注：《传习录译注》，中华书局 2018 年版，第 444 页。
- 36[13]张显清主编：《孙奇逢集》，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3 页。
- 37[14]习近平：《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的讲话》（2021 年 4 月 22 日，北京），《人民日报》2021 年 4 月 23 日。
- 38[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55-56 页。
- 39[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47 页。
- 40[2][4][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4 页，

第 11 页，第 51 页。

41[3]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67 页。

42[5][6]陈梦枚：《“伪生态文明建设”之风不可长》，《经济参考报》2014 年 12 月 24 日。

43[7][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602 页，第 683 页。

44[10]徐元诰撰：《国语集解》，中华书局 2002 年版，第 161 页。

45[11][12][14][15]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902 页，第 1479 页，第 1767 页，第 2671 页。

46[13][17]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 1998 年版，第 443 页，第 442 页。

47[16]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校释》，学林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781-1782 页。

48[18][20][21][22][23][24]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87 页，第 206 页，第 495 页，第 86 页，第 888 页，第 889 页。

49[19]王天海校释：《荀子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 页。

50[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73 页。

51[2]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55 页。

52[3]习近平：《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7 页。

53[4][5][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0 页，第 21 页，第 30 页。

54[6]习近平：《生态兴则文明兴》，《求是》2003 年第 13 期。

55[8]黎翔凤撰：《管子校注》，中华书局 2004 年版，第 1018 页。

56[9]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666 页。

57[10]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 2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71 页。

58[1][6]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 2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50 页，第 250 页。

59[2][3][4][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4 页，第 90 页，第 33 页，第 33 页。

-
- 60[5][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603 页，第 603 页。
- 61[7]习近平：《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9 页。
- 62[1][5][6]沈约撰：《宋书》第 5 册，中华书局 2018 年版，第 1677 页，第 1677 页，第 1677 页。
- 63[2]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424 页。
- 64[3]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337 页。
- 65[4]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 4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0 页。
- 66[7][9][10][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4 页，第 65 页，第 65 页，第 144 页。
- 67[8]《建设好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让广大农民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人民日报》2018 年 4 月 24 日。
- 68[1]朱谦之撰：《老子校释》，中华书局 2000 年版，第 298-299 页。
- 69[2][3][4]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634 页，第 2666 页，第 2666 页。
- 70[5]王天海校释：《荀子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81 页。
- 71[6]黎翔凤撰：《管子校注》，中华书局 2004 年版，第 261 页。
- 72[7][8][9][10][11][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8 页，第 20 页，第 26-27 页，第 35 页，第 35 页，第 56 页。
- 73[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507 页。
- 74[14]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4 页。
- 75[1][3][6][7][8][9][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52 页，第 99 页，第 110 页，第 109 页，第 99 页，第 99 页，第 21 页。
- 76[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603 页。
- 77[4][5]王文锦、王永兴等点校：《通典》，中华书局 1988 年版，第 18 页，第 15 页。
- 78[1][2][3][4][5][6][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3 页，第 105 页，第 110-111 页，第 100 页，第 109 页，第 109 页，第 109 页。
- 79[8][9]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598 页，第 1598 页。

80[10]朱谦之撰：《老子校释》，中华书局 2000 年版，第 118 页。

81[11][12]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中册，中华书局 2012 年版，第 338 页，第 338 页。

82[13]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上册，中华书局 2012 年版，第 125 页。

83[1]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校释》，学林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226 页。

84[2][3][4][5][6][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16 页，第 119 页，第 118 页，第 120 页，第 122 页，第 116 页。